

## “非洲学”的演进形态及其中国路径

刘鸿武

**内容提要** “非洲学”是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19世纪晚期以后,西方的非洲研究逐渐成为大学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社科分支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研究活动由西方扩展到全球,成为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当代中国的非洲研究肇始并建基于20世纪中叶新中国建立后与非洲交往的需要,推进于中非交往合作快速发展面临挑战的广泛知识需求。目前,中国非洲学建设发展的核心任务与基本路径,应该是在秉承中华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深入观察和综合把握当代中非发展合作的民族实践,形成可以说明、解释和指导这一民族实践的原创性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并在学科建设的一些基础领域做出持续的努力,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学术品格而又融通中外的“中国非洲学”。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非洲学 学科内涵 演进形态 中国路径

---

\* 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授。(邮编:321004)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5ZDA066)、浙江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未来10年大国在非战略博弈与中国非洲学建构及使命”(项目编号:2013GH001)的成果。

中国的“非洲学”或“非洲研究”，是当代中国“域外研究”的新兴领域，也是当代中国“新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非洲全方位合作关系的快速推进，随着“中国在非洲”日益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认识中非关系”也越来越成为“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作为当代中国知识结构变化的一个特殊窗口，中国对非洲的认识和研究走过了缓慢曲折的百年历程，积累了许多自身的经验与成果，也面临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在中非关系全面拓展、快速提升的今天，中国的非洲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在一些更具基础性的领域做出持久的努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努力提升自身的专业化学科建设水平，需要在众多学者分门别类地开展非洲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宗教和生态等诸领域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些各种各样的非洲区域研究、领域研究、国别研究、专题研究等等，融合到一个兼具包容性与开放性，同时又可统摄各类研究活动于一体的专业框架结构中，从而逐渐地形成一门相对统一的“中国的非洲学”学科体系，包括支撑这一学科成长的非洲学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学位体系与师资体系，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以及支持各类研究活动得以开展的服务平台，如关于非洲的图书资料、文献档案、信息网络、期刊杂志，以及田野调查、国际合作机制等等。

本文从当代中国思想创新与知识建构的战略背景上，梳理“非洲学”这一学科在国内外兴起的历史背景、知识源头、思想图景、价值取向、学科结构，并结合笔者30年来从事非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实践活动，对今日中国学者如何更好地认知非洲、研究非洲，从而建构起有自身精神气度的“中国的非洲学”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

## 一、“非洲学”：概念辨析与脉络梳理

所谓“非洲学”，简单的定义就是“研究非洲的学问”。大体上说来，这是一门在特定时空维度上将研究目光“聚集”于非洲大陆这一空间区域，对这块大陆的自然与人文现象进行综合性、专门化研究的学科。换句话说，所谓“非洲学”，就是对那些有关非洲的各种知识、概念、思想、学问的实践活动及其理论成果的统称。

对人类知识与思想活动进行类型化标注或体系化整合，从而形成各种各样门类化的“学科”或“专业”，是服务于学术研究的一种工具与手段，其边界与有效性总是相对而且人为的。学科演进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分化又不断融

合的过程,一方面,学术需要“分科而治”“分科而立”,这是对“科学”的最一般性理解。因为人类的学问汪洋肆溢,知识无边似海,因而得归类、分科、条理,成专业化领域,才可挈纲统领,把握异同;另一方面,人类知识本有内在联系,为一整体,在分化、分科、分治之后,又要特别注重各学科间的统一灵魂及其综合与联系。<sup>①</sup>而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往往是在那些边缘领域、交叉领域、跨学科领域获得突破而向前推进的。作为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学科特质的“非洲学”,其成长也一样要走这样的道路。<sup>②</sup>

因而,学科定义与知识类型的边界划分,因其相对性,可宽可窄,可大可小,过宽或过窄,皆各有其利弊,对“非洲学”的内容定义和理解与一样。事实上,对于“非洲学”这一概念,正如“国学”这一概念一样,有人认可,有人不认可。考虑到非洲研究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参与到“非洲研究”领域中的研究主体或认识主体也差异极大,存在歧见在所难免。本文尝试在当代中国学术日见开放包容且不断深化的语境下,对“非洲学”的概念范畴及其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

首先,就学科定义与内涵而言,所谓的“非洲学”,可定义为“一门专门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探究非洲文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对此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非洲学”,包括了一切以非洲为研究对象的知识与思想领域,涉及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各学科领域所做的非洲问题研究;而狭义的“非洲学”,则主要是指以非洲大陆的文明进程及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学科,主要采用一般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类似于侧重过往的“非洲文明研究”或侧重现实的“非洲发展研究”。

其次,“非洲学”是一门综合交叉性学科,为了综合把握、整体理解非洲问题的复杂性,从事非洲问题研究,往往需要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方法与知识工具,比如,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视角,对非洲文明、非洲文化、非洲发展等各个领域进行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近些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跨学科对话的发展,非洲研究领域出现了更多样性的研究工具与理论形态,如国家建构理论、全球治理理论、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理论、安全与维和理论、减贫与社会发展理论、公共

<sup>①</sup> 刘鸿武:《人文科学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sup>②</sup> 刘鸿武:《打破现有学科分界是人文学科的发展之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mzgz\\_1653/201406/t20140624\\_1225205.shtml](http://www.cssn.cn/gd/gd_rwhd/gd_mzgz_1653/201406/t20140624_1225205.shtml),2016-08-22。

卫生建设理论等,使得“非洲学”的学科知识结构与研究工具呈现出更多元的形态。

一般来说,“非洲学”与“非洲研究”两个概念可以换用,但意义有所不同。“非洲研究”这一概念的内涵清楚,无须特别解释,总体上是一切与非洲有关的具体的研究活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总称,但凡与非洲有关的研究都可统其门下,而“非洲学”则突出了它的学科主体性、学理建构性,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理论旨趣、学科发展路径与体系建构,并期待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新兴学科。<sup>①</sup>

目前,中国通用的学科类型划分方法,大学的学科建设,多按照所谓的“一级学科”为基本单位来划分和建设。而这些“一级学科”的设立与划分,又都是按“领域”划分而不是按“地域”划分的。所谓按“领域”划分,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艺学等等。很明显,这种按“领域”的学科划分方法,是不利于类似“非洲学”这样的地域(区域)研究学科的成长。从学科属性上看,像“非洲学”或“非洲研究”这样从地域着眼并具有突出的跨学科特性的综合交叉学科,往往没有合适的可归属的学科,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上看,它似乎都难于归入到任何一个所谓的“一级学科”中,比如,把“非洲学”归入“经济学”或归入“政治学”,又或者归入“历史学”等等,都不是很妥当。因为这样的归属其实可能是一种限制,比如,如果把“非洲学”简单地归属为政治学或经济学一级学科中,那它就只能按照政治学或经济学的通用标准来建设,人们就会简单地用政治学或经济学的框架标准来评价和要求非洲学,来评估非洲学的建设水平与功用。而事实上,非洲研究所大量涉及的领域与内容,都是政治学或经济学所不能完全覆盖或包容的问题,是一般政治学或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所不能单独解释、完整说明的问题。因而将非洲学归属到某个现有的一级学科的做法,明显地限制了它的发展,也是不利于培养专门化、综合性的非洲学人才。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及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我国现行的“一级学科”设置与建设模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其阻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殊学科成长的弊端及解决出路的讨论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对此,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与构想,在国家管理层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比如,2016年5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

<sup>①</sup> 梅新林:《构建“非洲学”新兴学科的学术路径》,《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28日,第8版。

近平同志在出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二是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三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四个步骤，一是要突出优势，二是要拓展领域，三是要补齐短板，四是完善体系。他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sup>①</sup>

习近平同志所述阻碍中国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情形，在中国的非洲研究领域有着更突出的表现。因为非洲学正是一个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它既是目前我国学科建设中的“短板”，其学科地位与意义应该得到承认，同时它也可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国际问题研究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点”。从根本上说，要促进中国非洲学的成长，就要克服长期以来中国高校与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与划分的“这些短板”，需要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有一些创新、变通的切实举措，通过设立“非洲学”这样的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与身份，同时，在国家的学科建设、学科评估、学科投入方面，给予相应的关注与重视。

与按照“领域”（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划分学科不同，“非洲学”是一个突出研究对象上的“地域”（非洲、中东、东亚、南亚、拉美等等）属性的交叉学科。作为一种变通的做法，或许可以通过确立“区域学”（区域研究）这样的学科概念来建构非洲研究的学科基础，并大体上将“非洲学”归入“区域研究”范畴。虽然目前人们对于“区域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学科”仍有争议，但以非洲大陆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非洲学”或“非洲研究”在当代世界的兴起，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着的客观事实。

## 二、“区域研究”：中华学术的传统品格

事实上，对中国而言，“区域研究”并非舶来品，作为一个特别具有“文明发展的时空意识”的民族，中华学术传统中一直就有某种“区域学”的历史精神与丰富实践。所谓“文明发展的时间意识”，是指重视事物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参见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518/c1024-28361421.html>，2016-05-25。

进程与时间关系,凡物换星移,自川流不息,而时过境迁,当与时推移。而所谓“文明发展的空间意识”,则是指重视事物生存空间环境的差异多元,需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入乡随俗,因地制宜。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一书及其所体现出的思想智慧,便大致可以看成中国最早的一部“区域研究”著作,《诗经》的精神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学术对于区域、地域、文明等“时空概念”的独特理解。《诗经》凡三百篇,大体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之“风”则有所谓的“十五国风”,如秦风、郑风、魏风、卫风、齐风、唐风、豳风等等,此即时人对于周王朝域内外之十五个区域(“国”)的民风民情(“区域文明”)做认识的诗性文字表述。在当时之人看来,采集这十五个地方的民歌风谣,可观风气,听民意,从而美教化,移风俗,施良策,治天下。这与今日中国要建立区域国别研究学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学科的宗旨,可谓是“古今一理”,本质相通。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思想之务实精神的民族,尊奉实事求是、理论来自实践的认识原则,由此而形成了中华学术区域研究中“由史出论、史地结合”的治学传统。历史上中国人就有比较突出的时空交错、统筹把握的文化自觉,因而管理社会,治理天下,历来主张既要通盘考虑天下基本大势,又要因地制宜,一国一策,一地一策。所谓方志学、郡国志、地理志,皆可视之为历史上中国的“区域研究”传统。在中国文化的思想传统里,所谓国有国史,郡有郡志,州、府、县、乡亦有治理传统与本土知识。故而说到国家治理,社会协调,区域管理,中国人都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白“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中国人看来,人处不同区域,风土人情、制度文化各有差异,因而无论是认知他人,理解他人,还是与他人相处,都应该是“因地制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好的治国理念原则,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必然是注重人类文明的地域结构与环境生态的差异性与历史多样性,动用时空结构层面上开阔整体的“会通”眼光,依据对象的真实情况,即所谓的区情、国情、社情、民情、乡情,实事求是地努力去了解、理解、适应、建构生活在此特定时空环境中的“这一方水土与一方人”的观念、文化、情感与制度。

在这样的历史时空意识下的“区域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深入到该特定区域、地域、环境里去做长期的调研,也就是“深入实际”的、通过调查而开展的研究,而不是待在象牙塔中、静坐在书斋里的那种概念游戏、文字游戏。它要求研究者要“换位思考”,努力融入研究对象之中,在主位与客位之间穿梭往来,内外观察,多元思维,多角度理解。这种深入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实地研

究,有助于研究者超越僵化刻板地套用某种“普世主义”绝对教条来理解生生不息、千姿百态的天下万物。在中国人看来,认识世界、治理国家,唯有“因时因事因地而变”,方可穷变通久,长治久安,若滞凝于某种僵化刻板的“绝对理念”,从概念来推演现实,用“这一方水土这一方人”的观念来强求“那一方水土与那一方人”,一把尺子量天下万物,必然是削足适履,缘木求鱼,得不到真理。

因为此种对多元地域、时空结构的历史性理解,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权体制,与域内域外各民族、各地方政权、各周边族群和其他国家的相处往来,也注重施治和交往的地域变通性、区域适应性,并形成了一些具有特殊中国智慧的治国理念与制度模式。比如,历史上形成的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大体上可以看成是一种中国多元地域文明治理的传统智慧,这些传统政治智慧所包含的思想内容与治理实践的理论总结,对当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的成长,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和民族接触过程中,也形成了基于自身民族传统智慧与精神的对外交往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之所以一开始就提出“求同存异”的原则,提出亚非合作“五项原则”、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和后来对非援助的“八项原则”,都基于中国人对自我、对他人、对世界文明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理解能力与尊重传统。这正是中非合作关系走到世界前列、成为中国外交特色领域的根本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今日的中国要与非洲友好相处,要让中非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也自然先得要在观念上文化上懂得非洲,理解非洲,多从非洲的特定区域的时空结构上来理解非洲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些历史传统对当代中国建立自己的“非洲区域研究学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区域学”有意识地突出了对研究对象作“特定时空之综合会通把握”的特点。也就是说,但凡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都需要有一种敏锐的对此特定区域的“时间观念与空间眼光”的认知把握能力。<sup>①</sup>当研究这个区域时,研究者需要反问自己,真的了解这个区域吗?在此区域长期生活过吗?知道这个区域的民风民情、生活习性、制度文化乃至听得懂此地百姓的民歌谚语吗?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与人交往的古老习俗,又知道多少,明白几何?如果这些基本的素养都不具备,要做好此区域的研究是很让人怀疑的。

<sup>①</sup> 刘鸿武:《黑非洲文化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5 页。

每个区域的文明与制度、政治与经济,风俗与习惯,作为真实的历史存在,并不只是一些抽象出来的概念原则,不是到处可贴的空洞理论标签,而是在过往漫长历史过程中,在其特定的自然文化空间与历史环境下,逐渐地成长起来的。包括非洲在内的各个特定自然区域的文明、制度、文化,都是具有突出的地域特点、民族个性、时空痕迹的可感知的活生生的“生活存在”。研究者唯有长期扎根于对象地区,生活于此,行走于此,融入对象的时空情境,获得与当地人人感同身受的个人文化体验,才得以真切感悟这些特定时空中的鲜活生活,真正明白该区域文明的精神个性,而这一切正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路径与目标任务。正是因为有这些传统,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直对西方某些人鼓吹那种“普世价值”或“绝对理念”在国际政治与全球治理研究中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

“区域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区域性”“专题性”及“综合性”的创新性综合运用,它要求有纵横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灵活多维的治学方法,这也是它可能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发展重要突破点的原因。所谓“区域性”是指以某个特定自然地理空间为范畴的研究,诸如非洲、拉美、西亚、中东、东亚、南亚、中亚等等,当然也还可以做更进一步的划分,比如,非洲研究中的东非、西非、北非、中非、南非之类。在此类研究活动中,人们可以将某一特定的或大或小的、自然的或文化的或历史的“区域”,作为一个有内部统一性、联系性、相似性的“单位”进行“整体性研究”,探究这一区域上的一般性、共同性的种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专题性”则是指对此特定区域的问题作专门化研究,比如,非洲的政治、经济、环境、语言、安全等问题的专题研究等等。而“综合性”则是指这类研究往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交叉特点,需要从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军事与外交、文化与科技等不同角度,对这一区域的某个专门问题进行综合交叉性研究。比如,研究非洲的安全问题,就不能就安全谈安全,因为非洲的安全问题总是与其经济、环境、民族、资源、宗教等问题联系在一起。非洲某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其实又是与其周边国家、所在区域的整体安全问题纠缠在一起的。事实上,非洲的许多问题都具有跨国境、综合联动的特点,因而非得有学科汇通与知识关联的眼光,非得有跨学科综合研究的能力不可。<sup>①</sup>

---

<sup>①</sup> 刘鸿武:《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汇通与综合—关于非洲文化研究的一种新探索》,《思想战线》1998年第1期。

在这个意义上说,“领域、区域、国别、专题、问题”诸方位的交叉互动,多学科跨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分合转换,正是区域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今天,随着非洲的专门化研究日益深化与拓展,这一学科领域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之中。从目前情况看,一个研究者在涉足非洲问题研究领域时,往往已经难于明确地界定自己的学科属性,或简单地划定自己的学科边界与知识范畴了。可以说,今日推进非洲学这种综合交叉性学科的创新发展,正提供了打破以往那些学科界限壁垒而去沟通连接不同知识体系的机会与可能,也应该对今日中国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 三、历史脉络:非洲研究在现代世界的演进

考察近代以来学术发展进程,依稀可以看出这样一些在东西方世界里对于“非洲与非洲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传统与研究活动的演进过程。<sup>①</sup>

先来看西方的传统。西方对非洲的“发现”与“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sup>②</sup>在历史上,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对地中海南岸非洲大陆的研究,一般按不同时期分为如下几个领域,如“埃及学”(Egyptology, Egypt Studies)、“希腊罗马学”(Greece—Rome Studies)、“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或是“阿拉伯伊斯兰研究”(Arab—Islam Studies)等等,然后,在此学术语境下,南部非洲其他广阔地域的黑人文明往往只作为一个附带的因素有所涉及。

不过,这种情况在近代以后有了变化,逐渐地有了一个专门的词汇“非洲研究”,用来专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各族群文明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西方学术界,一直有许多学者试图以撒哈拉沙漠为界,将非洲大陆两分为地中海沿岸的北部非洲(阿拉伯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黑人非洲)两部分。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就“非洲研究”这一学科来说,虽然其研究对象包括了整个非洲大陆,但习惯上更倾向于认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文明的研究才是核心的内容。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如果没有特定的说明,那么,习惯上的所谓“非洲学”中的“非洲”一词,都是不言自明地专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涉及的都是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黑人文化与社会的研究内容。但是,将北部非洲与南部非洲分隔开来的这一观点,自从非洲大陆独立以

<sup>①</sup> [布基纳法索]J.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第1卷,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5页。

<sup>②</sup> [英]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信译,上海: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页。

来已经日益受到非洲本土学者的质疑。在非洲学者看来,虽然非洲大陆南北之间有差异,撒哈拉大沙漠也曾对南北文化交流造成阻隔,但非洲大陆从古到今,一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不能将非洲大陆简单地切割成南北两部分,割裂非洲大陆始终存在着的统一历史进程与复杂的文明纽带。

当然,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因为即便是专指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各族群文明的学问,也可以分成若干个不同的领域,如专门研究埃塞俄比亚(包括古时的阿克苏姆文明、中古时期的东正教文明、近代的阿比尼西亚文明等)的“埃塞学”或“埃塞研究”(Ethiopia Studies),专门研究南部非洲尼格罗族群之班图族文明的“班图研究”(Bantu Studies),及专门研究东非沿海斯瓦希里族群文明的“斯瓦希里研究”(Swahili Studies)等等。<sup>①</sup>

许多时候,非洲研究被理解为对非洲文明或文化的研究,因而,非洲研究也可以称为非洲文明或文化研究。从西方学界来看,严格意义上对非洲文明或文化研究,是19世纪以后才在欧洲一些国家开始的。也就是在此之后,随着西方对非洲的统治瓜分,随着西方学者对非洲研究的深入及其知识成果的传播与扩散,西方人也就为现代世界建构起来了一个包含着浓厚西方文化观念与标准的“非洲形象”,直到今天,现代世界在许多方面依然接受了这个欧洲根据其非洲的认识和在非洲的经历而建构的“非洲形象”知识体系,来认识、理解与评价非洲的,其中自然包含着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认知偏好与先入为主的武断。

近代以来,西方对非洲的看法与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虽然欧洲人从公元15世纪末已开始抵达非洲大陆南部的海岸地区,但直到19世纪初,欧洲人对非洲的了解仍限于沿海地带,对非洲内陆几乎茫然无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非洲大陆酷热的气候,沿海地区的热带雨林、蚊虫病菌所构成的自然障碍阻碍了欧洲人进入非洲内陆;二是在西方对非洲扩张的头几个世纪,他们除了在沿海购买黑人作为奴隶外,对非洲内陆尚无太多兴趣;三是“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进入19世纪,在欧洲知识分子心目中,漠视东方世界历史文化成就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日渐抬头,包括黑格尔这样的许多欧洲人都曾断定非洲大陆是一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的大陆,非洲只有欧洲人活动的历史,“其余就是黑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sup>②</sup>

<sup>①</sup> 刘鸿武:《蔚蓝色的非洲—东非斯瓦希里文化研究》,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sup>②</sup> [布基纳法索]J.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编史方法及非洲史前史》,第20页。

然而,就在黑格尔去世不久的 19 世纪 20—40 年代,西方对非洲大陆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在黑格尔去世的 1831 年,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把先前成立的民间团体“非洲内陆考察协会”合并于由政府直接管辖的“皇家非洲学会”,有组织地开展大规模的非洲考察活动。从 1830—1890 年,西方探险考察队先后深入非洲内陆进行考察活动近百次。这些考察活动旨在弄清楚非洲大陆的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矿产资料、人种语言等方面的情况。参与考察的人中有些是受过一定专门训练的研究者,他们的考察积累了非洲大陆在语言、人种、宗教、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方面的大量资料,与早期传教士、冒险者和贩奴者所写的游记大不一样,较为系统全面,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现代非洲学的最初起点。这些考察活动,对 19 世纪晚期西方现代人类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亚非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非洲独立国家相继涌现,西方殖民体系趋于解体,世界开始了对于非洲大陆的重新认识过程。在西方世界,一些原来的非洲殖民宗主国调整其对非洲的统治与管理政策,更加重视对非洲社会本身的认识,一些学术机构先后出现。1948 年,荷兰莱顿大学建立了专门化的“非洲研究中心”,非洲研究成为当代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开始了对非洲问题的综合化系统的研究。20 世纪 60 年代后,非洲研究真正进入到蓬勃发展时期。如到 1970 年,在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非洲研究书目的书中,编者收录的有关非洲研究的重要论著已达 4000 多种。曾有编著者把这些论著归纳为 100 个专题,在每一个专题下都附有长长的参考论著。<sup>①</sup> 这时,非洲学已成为西方学术界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非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受到重视并逐渐发展起来,受到了各种因素的推动,也是世界体系逐渐发生变化的重要表现。

19 世纪 80 年代非洲大陆进入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时期后,西方国家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开发利用其统治下的非洲大陆,需要更多地了解当地的文化、种族、社会生活和传统政治制度,以制定相应的政策,于是对非洲的研究日益重视。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当西方从非洲大陆退出,其直接的殖民统治变得不可避免的时候,西方国家更是加强了对非洲大陆各方面的研究,以谋求在殖民时代结束后,仍然能保持宗主国在独立非洲国家的影响,并使这些国家保持与西方宗主国的特殊关系。比如,在殖民地时期法国文化和英国文

<sup>①</sup> John N. Paden, *The African Experience: Bibliography*, Evanston, 1970, p. 25.

化较发达的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独立后在文化上都一直保持了浓厚的法国文化和英国文化色彩。英国于1948年在尼日利亚创办的尼日利亚第一所现代西式综合大学伊巴丹大学,完全移植了英国伦敦大学的办学模式与学科结构,它后来成为非洲大陆最著名的一所高等学府。当代非洲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在1948—1960年期间由伊巴丹大学培养的。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非洲问题的研究已由征服探险时代的早期资料积累和描述性阶段,上升到对相关知识进行系统归纳、理论分析和综合概括阶段。这时,非洲研究已不限于早期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领域,而是扩展到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教育、社会变迁,尤其是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早期的人类学研究也进一步细分为人种、语言、艺术、文学、口头传说、音乐、舞蹈、宗教和考古学等不同研究领域。<sup>①</sup>另外,非洲研究在领域不断扩大、分支学科不断增长的同时,对非洲进行综合整体研究的趋势也在加强,“非洲学”渐成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研究领域。一些大学开始建立专门化的“非洲研究中心”或“非洲学院”,使得非洲研究日益成为大学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社科分支学科。与此同时,非洲研究的学术活动也由西欧扩展到全球,成为国际性的研究活动。特别是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非洲研究中崛起,同西欧国家呈平分秋色之势,并形成自己的特色、重点与优势。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独立运动的高涨及几十个非洲国家的涌现,以及西欧诸国无可挽回地丧失其在非洲的支配地位,刺激了美国对非洲大陆的兴趣。美国政府、私人基金会开始提供经费资助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非洲研究工作,包括对研究人员到非洲从事考察和研究的基金,在大学中开设非洲学课程,设立非洲研究基金和研究中心,协调组织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对非洲进行综合系统研究,出版研究刊物和论著。以20世纪60年代为标志,美国大学中有关非洲的课程有了迅速增长,涉及范围和内容更加广泛。一些传统学科也扩展了对非西方世界的关注,比如在经济系,开设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政治系开设政治发展研究、地区政治、现代化问题方面的课程,在社会学、法律学、历史学中,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也有了明显的加强。

在亚洲地区,日本、印度、土耳其是主要的研究非洲的国家。日本对非洲的研究兴趣,除基于人类学的发展外,更多的是有商业上的考虑,以拓展日本

---

<sup>①</sup> E. O. Ayisi,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Cultu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Ibadan, Nigeria, 1972, p. 82.

在非洲的市场为目标。近年来,日本在非洲大陆的经济与文化影响也悄然上升。印度历来与非洲有紧密的关系,如同中国的侨民集中在东南亚一样,印度侨民相当一部分分布在非洲,是当地一股重要的经贸与金融力量,因而印度对非洲研究有一定基础,如印度非洲理事会主办的《非洲季刊》是一份有国际影响刊物。此外,过去几十年,随着拉美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发展,基于双方在人种、语言、文化方面的特殊关系,巴西、古巴、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非洲研究也获得一定发展。

非洲大陆本身在20世纪60年代独立之后本土民族文化学派独树一帜,很快形成相当规模,目前,非洲本土已是世界非洲研究的另一重心。同时,冷战时代的苏联东欧集团为在非洲大陆拓展其势力,基于全球战略考虑对非洲文化尤其是种族、语言、宗教、政治的研究也有相当的关注。

非洲研究迅速发展的动因,更多地还来自于当代非洲发展现实的需要。非洲大陆独立以来,随着各国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现代化进程的坎坷艰难,以及这种发展问题与现代化进程日益显示出具有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的性质,从文化角度关注现实问题成为一种倾向。当代非洲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持续不断的动荡冲突,20世纪60、70年代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战略的挫折,都在到处显示着非洲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模式、价值体系、民族心理、宗教观念,是怎样强有力地制约着当代非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行为并规范着它们的现代化模式。越来越多的观点都在强调当代非洲的发展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文化重建与文明复兴问题,是非洲国家治理与制度选择的重新探路与思考问题,而从根源与复杂性上看,需要从文化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理解当代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重建问题,文化研究与发展研究应有机结合。

#### 四、求其友声:现代中国非洲研究的缘起与使命

近代以来,中国因严重落后于西方而开始了一百多年的执着地学习西方、跟随西方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文明具有的善于学习、善于吸纳的历史传统,逐渐让自己接近了西方思想的核心领域,拉近了自己与西方思想的差距,这为中国的复兴崛起起到关键性作用。相对于西方世界,现代意义的非洲研究在中国的出现是比较晚的,但中国迟早会突破近代以来在自己积贫积弱时期形成的某些学术框架束缚而重建自己的学术主体形态。过去几

十年,形态日益复杂多样的中非交往合作,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极好机会,立足中国现实需要去认识非洲、研究非洲,并最终从中形成中国非洲学知识、理论与话语体系。<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重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结构,并因此而开始了对于外部世界的重新认识与理解,国际问题研究随之兴起。这一演进过程是曲折而起伏的,它在整体上深受当时中国政治局势与对外关系变动的影响,而最初的起步,也具有明显的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特点。中国的非洲研究也一样,它肇始并建基于新中国建立后日益广泛而复杂的与非洲交往的需要,起因于中国与非洲全方位交往合作所面临急迫问题的解答要求。1955年4月,首届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中国派出政府代表团与会,并在会议期间与来自非洲国家的代表积极沟通,商议建立外交与文化关系。第二年,中国与埃及建交,由此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历史进程。随后几年,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一大批年轻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获得独立,中国与非洲国家纷纷建立外交关系,中非关系成为当时中国打破西方对华封锁、重返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关键战略支点。

在中非关系对中国日显重要的背景下,为了与遥远的非洲国家和人民交往合作,中国需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来认识非洲、了解非洲,这是中国非洲研究产生的最初动因。1961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非洲朋友时,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sup>②</sup>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相关学术机构开始推进这方面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前期,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了亚非研究所,在全国高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成立了专门化的研究非洲和中东的学术机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一进程受到严重扰乱,中国完整意义的非洲研究几乎停止,不过,这期间为了解外部世界,国家相关部门组织翻译了一批西方国家(部分包括苏联、东欧国家)的非洲研究著作与工具书,这可以说是中国对非洲了解的重要一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日益成功和中国步入世界政治外交舞台,中国学者的心态和观察世界的视角开始变化,现实地促使中国学者启动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的新思考,包括对过去关注不多的亚非拉国家的研究。

<sup>①</sup> 刘鸿武:《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3月版,第94页。

<sup>②</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465页。

在此背景下,过去 30 多年来,特别是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也开始进入较快的发展时期。<sup>①</sup> 最近几年,国内涌现了一大批非洲研究的机构,参与非洲研究的科研人员快速增加,各类学会、团体、基金专项、支持计划也逐渐形成,每年出版发表的有关非洲的著作、译著、论文、报告,举办的各种论坛、研讨会越来越多,国际交流人流涌动,往来中非间的学术活动也明显的拓展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非洲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充满朝气的学科,日渐呈现繁荣的趋势。

今天,“中国非洲学”建设与发展的基本任务与正确路径,应该是立足于观察研究当代中国与非洲发展、交往合作的民族实践,逐渐地形成可以说明、解释和指导这一民族实践的本土化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大体说来,中国的学者需要在三方面做出持续的努力:一是要在秉承中华学术优秀传统、借鉴融通国外学术资源、总结提炼中非合作实践的基础上,以融通中外、海纳百川的继承性与民族性,努力在指导思想、学术体系、话语形态方面充分体现出非洲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非洲研究的中国特色不是一个封闭偏执的特色,而恰恰是会通中外成果、继承古今传统的特色。

二是要以中非双方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立足中非双方的具体情况,以自尊、自信、自立的自主性与原创性,在深入非洲、观察非洲的过程中,着力解答中非双方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重大现实需要,努力去积累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从而在研究过程中与理论形态里呈现出中国非洲研究的自主创新意识。

三是要在众多学者分门别类把握研究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生态诸领域的基础上,以规范和严谨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将非洲的区域研究、领域研究、国别研究、专题研究,融会于一个专业性和系统性的学科框架结构中,形成兼具包容性与开放性,同时又可统摄各类非洲研究活动于一体的“中国非洲学”学科体系,包括专业化的“非洲学”学位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师资体系,及各类图书资料、专业实验室、档案馆、博物馆、田野调查基地等等的平台支持体系。当然,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离不开中国学者们的文化自觉与精神自立。<sup>②</sup>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中国的中东非洲研究(194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sup>②</sup> 刘鸿武:《非洲研究的“中国学派”:如何可能》,《西亚非洲》2016 年第 5 期,第 5 页。

四是中国的非洲研究应当有总体性的战略框架与路径追求,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与推进理念。目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因为缺乏战略性思维与宏观眼光提升,近年来非洲研究在中国虽然有很大进步,但总体上还处于比较散、乱、杂、小的状态,学科基础理论建构、方法体系探索、知识结构积累、特色田野调查等都有待加强。如何统摄各领域的非洲研究活动,形成分合有序、特色突出、整体协调的中国非洲学的战略布局、地区布局、学科布局,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五是需要通过整合协调而逐渐形成一门相对统一的“非洲学”学科。或许有人认为不可能建立一门相对统一的“非洲学”学科,因为从表象上看,非洲研究涉及非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研究人员和对象一直分散在众多学科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分散性、交叉性,要以一门相对统一的“非洲学”,将这些分散的研究活动统摄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然而,如果仔细观察与深入思考,仍然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非洲研究”(诸如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研究,以及非洲国别、区域、专题研究等等)的内在关联性。

六是要在强化实证研究、个案分析、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学术重视追寻“文明大道”、努力探究“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思想传统,透过非洲大陆纷乱复杂的当下迷局,看清这块大陆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努力去举其纲要,观其大势,对非洲各国各方面的基本问题做出更具历史眼光的战略把握。<sup>①</sup>与世界各大洲都有南北关系不同,非洲是一块全是发展中国家的大陆,今日非洲大陆所有的政治、经济、安全、民族问题,本质上都与发展问题相关联。通过和平与发展而实现“国泰民安”,让人民“安居乐业”,是非洲今日的首务。为此,我们就可以形成一门以发展为核心理念、以发展为核心宗旨的新兴学科“中国的非洲学”,来对非洲的共同问题、基本问题进行整体把握,形成可以说明、解释并有助于非洲大陆现实需要的知识体系与思想体系。

七是要清晰地理解中国非洲学发展进步的动力资源就来自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中国非洲研究之所以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的自主创新之路,是因为它有着当代中国对非合作的丰富民族实践及对这种民族实践的独立观察与自主思考。过去60年来,中国与非洲数十个国家交往合作的丰富实践(无

<sup>①</sup> 宋代学者苏轼曾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得。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已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参见葛立方:《韵语阳秋》。这“意”,大致应该就是散布于各知识领域背后的统一灵魂与核心精神,统摄各种专门知识与研究活动的相互联系与整体结构。参见刘鸿武:《故乡回归之路:大学人文科学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论是经验与教训,还是成功与失败),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公司企业在非洲的经营打拼,过去 16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开拓实验与创新,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给中国学者提供了立足于中国自己的现实需要,“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去认识非洲、研究非洲的极好机会和特殊环境。这种现实的需要,会促使一切有学术抱负、文化自觉的中国研究者,跨出封闭的书斋,超越西方的框架,甩开本本主义的束缚,融入今日中非发展合作的实践洪流中去,不唯洋,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便是当代中国学术演进的总体趋势与基本方向,因为只有通过扎实具体的非洲田野调查与个案项目考察,只有深入到非洲民间的实际生活体验,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才能重新认识自我、认识非洲,认识中非关系,并最终从中提炼出中国非洲学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sup>①</sup>

## 五、彰显个性:中国非洲研究的情怀与话语

要达到这些目标,需秉承“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治学理念,遵循“承续中国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的治学路径,因为这将开辟出既秉承传统又融通现代、既有中华学术精神又融通了人类普遍知识的中国非洲学的新气度。<sup>②</sup>

研究非洲先要去掉对非洲的偏见,对非洲历史文化有一份“赏析关爱之情”,这就是“非洲情怀”。研究者有此情怀,才可能在非洲研究这一相对坚苦的领域长期坚持,才愿意一次次地深入非洲大陆,做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以自己的经历去观察研究非洲。中国古人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优良传统,而今天学者们需要坐的“冷板凳”,已不限于书斋中,它更包括了对非洲广阔田野与生活大地的长期行走。研究非洲的中国学人必须走出国门,到非洲广阔大地的真实生活中去开展持续而深入的观察,开展参与式的田野调查,积累一手资料,获得生活体验。所以说,“中国非洲学”的起点与路径在非洲大陆,归属与根基也在非洲大陆,而不在欧美,也不在书本。

<sup>①</sup> 刘鸿武:《在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建构国家话语权:再论建构有特色之“中国非洲学”的特殊时代意义》,《西亚非洲》2010年第5期,第10页。

<sup>②</sup> 这是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07年9月1日成立时,笔者所拟定的院治学理念与治学路径,参见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学术网:<http://ias.zjnu.cn/research/show.php?id=155>,2016-05-21。

因此,需要把研究基地前移到非洲国家,特别要强调的是做“调查研究”,即“通过调查而开展的研究”,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不再是那种困守在书斋中、空谈于沙龙里的本本主义的“范式研究”“概念研究”,或简单依靠西方数据库的那种貌似科学的“量化分析”或“模型研究”。<sup>①</sup>中国的非洲研究者们只有获得了在非洲国家的一线体验、一流人脉、一手资源,才可能正确地去认识非洲,研究非洲。为此,应该鼓励支持中国学者深入到中国在非洲大陆上的千千万万个合作项目和企业工地上,去做一线의长期跟踪观察,去“采风”,去做感同身受的“参与式”的研究。也要培养一大批真正懂得非洲的、从非洲国家的大学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留学非洲“海归”的人才。所有这一切,都是未来中国非洲研究进步必不可少的一个个关键环节。

另外,中国人研究非洲,应立足于中华学术的深厚沃土,立足当代中非合作的丰富实践,秉持中华学术开放、包容、持中的传统,以中国的视角与眼光来研究非洲,同时,也不能局限于中国的眼光,而应有更开阔多元的世界眼光,努力以融通中外(中西、中非、中阿)的学术视野来研究非洲和中非关系,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与“全球视野”。这方面,一个重要前提是对非洲和中国都有足够的了解,既知中国,也懂非洲,知彼知己,开展客观公正的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通过对中国自己的发展、对中非全方位发展合作的直接观察与深入研究,以及对构成这种发展的基础与背景的世界史、现代性和全球化现象的重新思考,日益有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与自主意识,并逐渐地开始“生成”自己独立的话语形态与理论面相。这让中国的非洲研究逐渐有了自己的基础、特色乃至话语概念。比如,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列举出一连串中国学者们经常使用的具有知识挑战性的思想命题或核心概念,诸如“改革”“开放”“治国”“理政”“发展”“稳定”“民生”“复兴”“安居乐业”“百年进程”“千年目标”“国泰民安”“发展规划”“援助有效性”“国家能力建设”“互利共赢”“平等相待”“义利兼顾”“产能合作”“不干涉主权原则”“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等等,而这些议题、话语、概念也逐渐在国际学术机构的各类会议上,在诸如“中非智库论坛”这样的学术场合,被来自非洲的学术精英、智库代表和政府官员所采用。<sup>②</sup>比如,2010年10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首次前往非洲主办大型国际学

<sup>①</sup> Liu Hongwu, “China-Africa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Reshaping of Modern Human Civilization,”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5, 2010, pp. 25-32.

<sup>②</sup> 关于中非智库论坛议题与概念的演进变化,请参见中非合作论坛网相关报道:<http://www.focac.org/chn/zxxx/t1067832.htm>, 2016-08-20。

术会议,与南非国际问题研究所合作主办“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十周年研讨会”。第二年正式创办“中非智库论坛”,并在随后几年与非洲各国智库合作,在中国和非洲连续举办了中非智库论坛五届会议,2016年8月,在肯尼亚蒙巴萨举办“中非媒体智库研讨会”等等。在这些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每次会议所设置的议题、使用的概念,讨论的重点,都是由来自中非双方的学术机构通过协商而定,都围绕着中非双方自己关心的核心问题而展开,中非学术发展的自主性明显增强。

但在过去许多年,在那些西方主办或主导的国际学术场合,每当讨论到非洲和中国、涉及中非关系时,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与话语,都曾总是诸如“集权政治”“新威权主义”“新庇护主义”“转型国家”“选举民主”“干涉原则”“人权状况”“保护责任”“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援助腐败”“捐赠者”“依附国家”“战乱动荡”“贫穷黑暗”等等。而在这些包含着突出价值评判倾向与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概念、议题下,非洲、中国、中非关系都往往是作为批判对象、负面形象出现的。而不幸的是,在过去相当时期,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中国和非洲出版的许多刊物、杂志、著作,也往往跟随在西方的后面,借人话语,用人概念,来言说自己的事情,用人家的标准,别人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的实践。于是,当西方理论与我们的现实不相符合时,我们总是自然地觉得是一定我们的现实错了,而不是西方的理论有问题。于是否定自己,“削足适履”。要完全改变这种被动状态,中国和非洲国家都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 六、退而织网:中国非洲研究的当务之急

中国人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凡事,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都不应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而必须付诸行动,在做的过程中探路、完善、改进。多年经历表明,今日中国的非洲研究事业真正要获得持续进步,既需要理念创新与话语建构,更需要实践的探索积累,需要付诸行动的实际操作。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推进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国内出现了许多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也面临一些基础性短板问题需要克服。

笔者从事非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已近30年,1991年笔者从尼日利亚留学回国后,到云南大学建设了非洲研究学科,先后建立了云南大学亚非研究中

心、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成为支撑云南大学世界史、国际关系两个学科的特色领域,并在这两个专业下培养了非洲研究方向的20名博士、56名硕士,其中不少已成为中国非洲研究后起之秀。但当年在云南大学所开展的这些非洲研究和人才培养活动一直是依托在世界史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基础上的,它本身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非洲学学科。直到2007年笔者到浙江师范大学创立非洲研究院后,才开始试图从基础上来建构一个相对独立与统一的非洲研究学科,并按此目标作了近十年的初步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

2012年3月,教育部在浙江师范大学首次召开了“全国区域国别研究工作会议”,本次会议是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转型、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快速调整的大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关于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指示精神,努力把握区域和国别研究的总体方向和相关政策,讨论区域和国别研究未来五年的发展规画和本年度的工作计划,完善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实施办法,探索建立协同合作的运作机制和成果分享的交流机制。此次会议的召开,表明国家日益重视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且将有力促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在这次会议上,教育部宣布在全国高校布局建立了30多家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会议期间还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建设经验作为案例加以推荐。<sup>①</sup>这里,笔者作为这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以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九年建设的经历为分析个案,对当下中国非洲研究事业的问题,当务之急及具体举措之如何落实,作进一步说明。<sup>②</sup>

一是有中国精神气派的“中国非洲学”学术理念建设问题。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学术传统的古老大国,中国的非洲学科建设需要一种整体宏观的发展布局与路径选择。2007年9月非洲研究院成立之初,便制定了完整的学科建设规画,明确提出非洲研究院的“治学目标”,是要“以若干年勤奋严谨的不懈努力,通过建构学术理念、创设学术流派、追求学术个性、打造学术品牌、培养学术队伍,最终建设成为一个学科综合、管理先进、水平一流、富于活力并可持续发展的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政策咨询为一体的国家级非洲研究机构,以学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为21世纪中非关系的全面发展、为中国非洲学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之提升做出贡献”。制定的“治学重点”是“当代非洲发展

<sup>①</sup> 朱慧:《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浙江师范大学网:[http://www.zjnu.edu.cn/news/common/article\\_show.aspx?article\\_id=14522](http://www.zjnu.edu.cn/news/common/article_show.aspx?article_id=14522),2016-08-10。

<sup>②</sup> 本文对此过程做了简要描述,以图为我们讨论中国的区域研究问题提供一些不成熟的案例材料。理论上的系统总结,或许要等到若干年后条件成熟时来完成了。

问题”与“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两大命题,以此统领全院四个研究所科研工作,让 20 多位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分别从非洲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历史、民族、宗教、国际关系等领域开展“既学有专攻又相互借重”的研究工作,共同探讨“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如何解决、中非合作关系如何推动中非发展并进而影响世界变革进程”这两大时代命题,最终形成自身的学术理念与个性品牌。追求的“治学境界”是“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既对非洲大陆怀有赏爱之情并以非洲研究为人生事业,又站在中华文化厚重土壤上追求非洲研究的中国特色,更以开阔的全球视野来认知把握中非关系与非洲问题。拟定的“治学策略”是“学术追求与现实应用并重、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兼顾”,既考虑研究院自身的学科建设与学术追求,又密切关注国家战略与社会需要,努力实现两方面的动态平衡。<sup>①</sup>

二是实体性的非洲研究学术机构的建基创业与长久维持问题。先筑巢,再引凤,2007 年创立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国内高校中首个实体性的非洲研究院,它不再是虚设的挂牌机构,而是大学中一个独立的学院制机构,有独立的人员编制、办公室场所、经费来源、管理团队。其下设了非洲政治与国际关系、非洲经济、非洲教育、非洲历史文化四个实体性研究所,还有院行政办公室、院科研与国际合作办公室、《非洲研究文库》《非洲地区发展报告》《非洲研究》《非洲智库专刊》编辑室等机构,建有国内高校首个非洲博物馆、非洲翻译馆、非洲文献中心与特色数据库,中、英、法、豪萨、斯瓦希里五种文字的院学术网(<http://ias.zjnu.cn>),与十多所非洲大学建有合作关系,并在喀麦隆、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建有孔子学院海外研究基地。目前,非洲研究院每年获得的各类研究经费都能保持在数百万元人民币,这些都是它得以持久发展的重要前提。

三是专职科研人员与管理队伍的培养与建设问题。经过多年培养与建设,目前在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已经成长起一支专门化的非洲研究队伍,有全职在岗在编的人员 32 人,这包括了管理团队 7 人,科研团队 25 人(含非洲籍学者 3 人)。其中有教授 4 人,副教授 14 人,科研人员均有博士学位和赴非留学、调研经历,是一支学科背景多样而又聚集非洲研究的学术团队。类似这样全职的、专门从事非洲研究工作的学术团队培养,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我国

<sup>①</sup>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建设理念与规划》,参见非洲研究院学术网:<http://ias.zjnu.cn/research/show.php?id=155>,2007-09-01。

非洲研究事业始终难以克服的专职团队建设不足、后继乏人的根本难题。

四是非洲研究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体系的建设问题。建立专门化非洲学硕士博士学位点,建构起完整的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制,形成可稳定发展的非洲学导师队伍,是我国非洲研究学科长远发展所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建立后,逐渐建立了非洲研究方向的“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和非洲史、非洲教育二级学科硕士点,2012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公示和备案,首次在国内高校设置了“非洲学”交叉学科硕士点,开始招收“非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首届研究生已于2016年毕业。201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公示和备案,首次在国内高校设置了“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点,并于2016年首批招收了三位来自非洲的“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专业博士研究生。这样,目前在浙江师范大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非洲研究的本、硕、博士学位体系。

五是成系列的非洲研究课程体系与教材体系的建设问题。非洲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其硕士博士课程体系可以按照类似一级学科学位点来建设,学生必须有多种途径赴非洲不同国家实习考察、做田野调查,或与非洲大学联合培养,在当地学习本土语言。目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已经自主编撰出版了可用于非洲研究专业人才培养的著作类教材30多种(卷),自主开设出了非洲领域的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层面的学位基础课、主干课、平台课、选修课、通识课共40多门,也开始开设非洲小语种选修课,这些课程已经广泛涉及非洲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语言、地理、资源、安全、政党、教育等各个领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非洲课程体系。

六是非洲研究的基础平台与支撑条件的建设问题。一个新兴学科的成长,如同创办一个企业、建设一支军队一样,既要有人,还要有物,有平台,所谓“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兵”,“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建立后,始终把支撑平台建设作为核心工作,九年来持续性地系统购置世界各国出版的非洲研究学术著作、工具书、图册、画册、音像制品、原始档案,以中文、英文为主,同时采购了部分法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及非洲小语种豪萨文、斯瓦希里文图书资料,总藏书量达到1万多种卷,其中外文图书占50%以上;每年订阅100种左右的中外文非洲研究专业期刊,其中外文期刊占50%,编纂《图资快讯》13期,提供相关资讯服务,建成了可供国内外研究者使用的非洲研究专业图书资料基地。2010年建成开放的非洲博物馆,集非洲艺术精品收藏、非洲文明研究、非洲文化知识普及为一体。多年来博物馆围绕“非洲民俗艺

术”与“中非关系史”两大主题,通过征集、购买、捐赠等多种方式逐渐丰富馆藏,还设立了专项经费,完成重点藏品的数字化工作,逐渐探索建设数字化非洲博物馆的途径,同时在上海、宁波举办了馆藏作品展,使之成为促进中非文化交流的新载体、普及对非知识的新平台。目前正在筹建坦赞铁路博物馆、中国援非档案馆,收集整理口述史资料与文献档案。

七是推进中国非洲研究国际合作进程问题。中国非洲研究必须走一条“非洲化”的国际合作道路。2011年10月28日,国内首家非洲翻译馆在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主要任务是通过系统地翻译非洲本土的文献、世界对非洲的研究成果、中国的非洲研究成果,向非洲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让非洲更了解中国,让中国人更了解非洲。截止到2015年,已经组织翻译并即将出版八卷本的《剑桥非洲通史》及其他领域的非洲研究著作文献十多部,翻译了《中国三十年》外译系列丛书,及中国文化遗产对非传播系列项目。在此基础上,2016年5月,浙江师范大学又成立了“非洲文学研究中心”,系统开展非洲文学研究与中非文化文献的研究与互译工作。出版了《20世纪非洲文献名家作品导读》《中非影视交流合作研究》《非洲艺术研究》等中外合作文集。<sup>①</sup>

八是在中国建立一所专门化的非洲大学的可行性问题。中非人才培养必须着眼长远,2010年,浙江师范大学在非洲研究院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内高校首个实体性的培养涉非专门人才的本科学院“中非商学院”,同时在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建立对非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与硕士专业,与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合作,在非洲三国建立海外实训基地,招收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本科、研究生,组织中非学生交流互换。目前,中非商学院已经招收五届本科生,前往南非高校学习和联合培养的中国学生已达60多人次,首届中非商学院的本科学生已经在2015年毕业,国际教育学院对非汉语本科专业、硕士专业也毕业多届学生。2016年,浙江师范大学“对非汉语国际推广硕士研究生培养理论与实践教学成果”获得“中国学位与研究生学会研究生教育成果二等奖”,从一个侧面表明,浙江师范大学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专业研究院与本科学院相互配合、科研成果与教学成果相互转化的学科建设良好格局。上述这一切,为今后建立一所专门化的“中国非洲大学”积累了独特的实践经验,奠定了初步的学科基础。

<sup>①</sup> 上述具体内容请参见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学术网站的相关报道:<http://ias.zjnu.cn/show.php?id=6058>,2016-06-20。

#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16

Vol. 37 No. 6

## FOCAL TOPIC:

### Area Studies in China: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s

#### The Thought History of American Area Studies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 *Niu Ke* ( 9 )

In the decade from 1943 through 1953,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led the founding movement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movement was not onl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the shortage of expertise about the world, but also to realize an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amid concerns and reflection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life. American areas studies took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global coverage” as its core tenet and goal, which was expected to transform American social sciences and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present state of academic professionalization. Th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relativism,” as advocated by the movement, constituted a major self-conscious endeavor by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tellectual elites to countervail American ethnocentrism and Western cultural parochialism.

#### The Evolution of “African Studies” and Its

China Approach ..... *Liu Hongwu* ( 41 )

With the African continent as its research subject, “African studies” is an integrated and cross-domain discipline that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African civilization as well as it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African studies in the West had gradually become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in China originated in the mid-20th century due to the necessity of dealing with Afric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fac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it made headway as a result of widespread knowledge deman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rowing challenges. At present, the core task and fundamental approa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frican studies is to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to deeply observe and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national practices of Sino-African developmental cooperation, to construct original theoretical and discourse system which can expound, explain and guide those national practices, to make incessant efforts in some basic domains in terms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to ultimately build a "China African Studies" with Chinese academic character as well as integrated Chinese and foreign characteristics.

## Stud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 Political Theories ..... *Zhao Chen* (6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Western studies of European Union (EU) politic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Western Europe after the 1990s. Meanwhile, the core topic also switched from explaining the EU integration, to analyzing the EU's govern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eventually to the phase of constructing the EU. In China,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the study of EU politics is to generally track down Europe's integration, and the second stage is to make the studies more social scientific by introducing Western EU political theories. The final stage is a pragmatically oriented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phase. The European academia's own theoretical explication of the EU's political integration has gradually matured and ultimately become the mainstream polit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out the EU through continuou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merican academia. In light o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China's current approach of the studies of EU politics is promising, but at the current stage sufficient innovation in the domain of theories of EU politics still lacks.